

【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

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 /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 斌

封面设计:孔晓军

责任监制:刘青海

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 7226 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插页 266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 000

ISBN 7-5418-1618-3/I·440

定价:20.00 元

第一章 命运的弹指声

—

他两级并一步地走上楼梯，心里暗暗为自己的肌肉还富有弹力，脚步仍然轻捷而觉得快慰。送他的上海牌轿车刷地一下掉了头，前大灯在楼道的窗户上一扫，很快就消失了，楼道即刻陷在黑暗之中，像一眼很深的枯井。他在二楼的台阶上磕绊了一下，但没有摔倒，这再一次证明他的反应力没有下降，至少还和三十多岁的人一样灵活。最近，他经常在遇到意外的活动障碍后有意地测试自己的机体组织。磕绊了一下，站定以后，他不觉微微地笑了。

现代医学，把四十五岁以上的年龄称作初老期，即老年前期，并把四十岁以上的人列入老年病早期预防的对象。他知道生物的衰老具有一定规律的阶段性特征，超越衰老的自然进程而出现加速老化、提前老化的现象，称之为早衰。有些刚过四十的中年人，由于弹性的减退和器官的过早老化，上楼梯时就感到气急、心悸、胸闷了。而这些症状他全然没有：他今年四十五岁，在身体的各方面仍然自我感觉良好。既然有“早衰”，那就应该有“迟衰”。但医学界还没有注意这种现象，至少在他了解还没有。“迟衰”是一种特异的秉赋？抑或是后天锻炼的结果？他相信这是长寿的征象，而长寿是

有遗传性的。他祖父在农村活到九十六岁，并且在九十岁的高龄上创造了安然度过“低标准、瓜菜代”的奇迹，他父亲是祖父最小的儿子。父亲虽然只活了五十七岁，但父亲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不能作为他推测自己潜在的健康因素的依据，所以他确信自己是得天独厚的，而这种以自己体质的自信又是促使自己“迟衰”的一个心理因素。他清楚这一点，于是，在平时，他从各种对自己机体组织的细小的考验中有意加强这种自信。

他很喜欢把中年、青年合并在一起的提法，譬如“中青年干部”、“中青年科技人员”、“中青年作家”、“中青年教师”等等。把中年和青年作为一个概念，在他这个惯于过观念生活的人脑子里，仿佛会消除中年与青年之间的生理界限，而使自己的青年期延长。这好像很可笑，带有形而上学的味道，他也很自然。本来嘛，死，才是一个限定；这个限定在一般情况下，谁也难以预卜。那么，人从生到死，又何需划分这样多阶段？这些阶段，又难道不是形而上学的么？有的人没有到所谓的衰老期已经老了，有的人到了所谓的老年前期却正是青春焕发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

他丝毫没有觉得气喘地在四楼自己的单元门口站住。门下泄出一线黄色的灯光，但他还是掏出钥匙开开门。

和他结婚不久的罗海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歪着上身，在罩着粉红色纱罩的落地灯下捧着一本厚书，聚精会神地读着。见他进来，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你呀，纯粹是个卡列宁！”

“是吗？”他又微微一笑。但灯光使他眯缝起眼睛，笑容就带着一丝嘲讽的神情，“那么你就是安娜罗，我祝愿你找到一个沃伦斯基。”

他知道她捧的那本厚书一定是她百看不厌的《安娜·卡列尼娜》。

“我迟早要找的！迟早会找到的！”海南啪地合上《安娜·卡列

尼娜》，愤然地反唇相讥。

“我毫不怀疑。”他轻轻叹息一声，脱下外衣，挂在衣帽架上，随即推开自己小书房的门。但又回过头来说，“不过，我奉劝你和你的沃伦斯基采取措施，不要像安娜一样又生出一个女儿来。我对计划生育可是抓得很紧的。”

他无声地关上门，在黑暗中准确地扭开台灯。柔和的灯光从书桌上缓慢地铺泻开来。

小书房大约十平方米，陈设简单，但几桌清静。墙上挂着那幅由意大利记者拍摄的周总理的相片，隐没在由一丛文竹形成的阴影里。相片中的背景和这团阴影非常地调和。另一幅荣宝斋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却似乎在朦胧的光中活动了起来。靠墙放着两个书架，书籍成双排地整整齐齐地插立在那里。书脊多数是平装的，但也有烫金和线装的。他把小书房称作自己的“加油站”。多年的秘书工作，使他养成了只有在安静的环境里才能读书和思考的习惯。这常常给他带来不便，但他知道只有在“加油站”加足了油，才可以获得在复杂的政务活动中对付种种出其不意的事情的应变力，所以他坚持在书房里不看文件，在办公室里只办公，而又使二者相辅相成的方法。这种方法，逐渐形成了他固定的生活习惯了。

这间小书房是属于他独个儿的天地：他不容海南染指。刚刚搬到 T 市来，客厅和卧室还没收拾好，他一个人把自己的小天地就布置妥当了。他不能容忍这里有任何一点居家气氛和与他气质不协调的摆设，那会破坏他思考时的情绪。而理性思考的进程和结果，往往受思考时的情感状态的制约。海南比较喜欢暖色调，比如红色、粉红色、紫色和咖啡色，而他却比较喜欢冷色调，小书房里的灯台、窗帘、沙发布都是淡绿色的。他也知道，海南之所喜欢暖色调，不过出自这样一种谬见，以为借着红色、粉红色反映出的光，会掩盖她那老姑娘特有的憔悴和暗黄的肤色。殊不知有时这种光反

更衬托出她的——怎么说呢，按医学术语来说应该是——“早衰”。当然他没有跟她这么说，和年龄比自己小很多，而实际的生理状况相差却并不那么悬殊的妻子相处，需要处处谨慎小心地维护她的自尊心。

但是，年轻的妻子并不尊重他的自尊心。刚才的话虽然近乎玩笑，却败坏了他进家门前的愉快心情。理解与不理解，温暖与不温暖，常常仅在一句话上就能表现出来。海南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妇女，她的玩笑里面总有着某种含义和旨趣。醋酐和水虽然都是无色的液体，却绝然不同而且具有刺激性。“卡列宁”！他心头掠过一丝不快。一个不理解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的妻子，有时比反对你的敌人还要令人烦心。

他踱到窗前，把绿色的窗帘撩开。从四楼望去，整个城市灯火寥落，夜阑人静。西边，不远处的电石厂放射出一片强烈的红光；今夜没有风，电石厂大烟囱里冒出的乳白色的烟雾，穿过边缘模糊的红光袅袅而上，一直到那浩渺的天顶上才溶化开来。夏夜的星光灿烂，但大大小小，明明灭灭，毫无规则地撒落在深蓝色夜空上的群星，却又使他联想到 T 市的杂乱无章。这种夜景，非但排遣不了他心中的不快，还更增添了心理上的负担。

“八方湖山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过去，他不知道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副对联。今天，当了市委书记，他才深刻地体会到这副对联的含义。

他住的这幢楼在城市的边缘，虽然只有四层，在这个城市也算高层建筑了。在一片片朦胧的阴影后面，他知道那里隐藏着许多湫隘简陋的土坯房，好些还是解放前，甚至是上一个世纪的产物。和他站的楼同层的新宿舍楼，疏疏落落地在整个城市东一幢西一幢地伫立着。没有风格，没有个性，在淡青色的路灯中，每一幢楼的面目都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不用去视察，那里也和他住的这幢

楼一样：灰顶塌落，天花板漏雨，水泥地面粗陋得跟海滨的沙滩一样，二楼以上就上不去自来水……，就是这样的房子，也是市民们的天堂。

刚才，他从座落在市中心区的市委回来，快到市区的边缘时，上海牌小轿车的两道灯光，从当作路篱的小榆树丛中扫出一对对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他们神色仓皇，但向小轿车投来的眼光也同轿车的前大灯一样地刺目。司机老高告诉他，T市也有许多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当教员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力气，也没有“关系”，在已快倾塌的土坯房外，再接上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只好一家人来个“大团圆”。青年人谈恋爱，总不能当着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面吧，不到这僻静的马路上来到哪儿去？

“还有邪的哩，”胖老高掌着方向盘说，“我现在要是把你拉到公园去，那儿准有一对对儿搂着睡觉的。你要过去干涉他，那两口子会掏出结婚证来揍你，你说咋整？……”

胖老高笑着，他却笑不出来。住房、职业、交通、教育、产品的分配和商品的供应……种种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现在统统累起来成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历史的使命”，这个概括的、很抽象的词组，在他面前将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甚至非常琐屑的事务。在这种关头，他非常希望妻子在精神上支持他，和他共同享受斗争的幸福或不幸。然而，他遇到的却是海南这样的女人。

他放下窗帘，在极有限的空间踱了几圈，最后把自己结实的身躯沉重地落在藤椅上，沉重得似乎加上了他那抽象的“历史的使命。”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他皱蹙着眉头，蓦地陷入了一阵迷惘之中：命运仿佛同时给了他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市委书记，使他脱颖而出，一个是海南，使他掉进了一个无形的罗网

……

二

“如果叫你去当一个市委书记，你会怎么样干？”

这个问题提得又突兀，又不好回答。

他第一次听省委书记孟德纯这样问他，是在去年冬天陪孟德纯去北京开会的火车上，而正是那次去北京，促成了这场奇奇怪怪的姻缘。

当时，他和孟德纯睡在一个软卧包房，另两名随员在隔壁。胖胖的省委书记在餐车吃完了饭，回来倒头便睡。这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从来不过放过休息的机会。六十多岁了，保养得还跟一个刚出笼的馒头一样。尤其在睡觉的时候，枕着两个软的枕头，双下巴陷在圆滚滚的脖子里，一绺花白的头发耷拉在宽阔的额头上，厚厚的嘴唇微张着，露出一一种天真的痴呆的表情。轻轻摆动的列车摇晃着他，如果不是老头子打着很响的鼾，真睡得和摇篮里婴儿似的。

到了傍晚，火车已经跑了十个小时。水气像一层银色的薄膜贴在车窗上，车厢里光线很暗，他开台灯，老头子才惊醒过来。

孟德纯先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很长很深的哈欠，然后又和睡着了似的，没有改变姿式地躺在铺上一动不动，用一种研究的眼光久久地凝视着坐在对面铺上看书的他。

他感觉到这道令人不安的目光，本能地向省委书记瞥了一眼。这时，孟德纯才用那刚睡醒的瓮声瓮气的声音问：“你看的什么书？”

和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一样，他把封面向孟德纯展示了一下：“《钱商》。一本美国小说。”

“什么意思？”

他把书合在铺着白台布的小桌上，揉揉眼睛，按书前的“内容

提要”向省委书记叙述了故事。

“唔，唔。一本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说。”孟德纯用他惯用的方法作了概括，手撑着铺坐了起来，“你还爱看小说？”

“这也是学习嘛。”他笑了笑。

“这也是学习？”孟德纯睡足了觉，感兴趣地问，“譬如说，从这本书里你能学到什么东西？”

“至少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资本主义。”他说，“只有把资本主义吃透了，才能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学《资本论》、出国考察，最好不过的就是看西方的小说了。恩格斯就说过，他从巴尔扎克那里知道的东西，比从社会学家那里知道的东西还多。”

“嗯，有意思。”孟德纯转过身来，在铺上盘起双脚，身体随着火车微微晃着，“那以后你也给我找几本外国小说看。”

“只怕您没有时间，看着看着要打瞌睡。”他笑着说。“以前朱书记也让我给他找外国小说。我给他找了好些，可他一本也没看，只看了一部《红楼梦》。”

“看《红楼梦》也好嘛。我也只看了一部《红楼梦》。”

外面的天色完全黑了，车窗像一只黑色的眼睛，映着它在包房里看到的一切。孟德纯思忖了一会，突然问：

“朱敦武给我介绍你那些情况，是真的吗？”

他抬起头看着孟德纯：“我不知道朱书记给您介绍了些什么。”

“喏，说你‘造’过他的‘反’，后来又保护了他。”

他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你这个秘书怎么也‘造’书记的‘反’？”孟德纯喝了口茶，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那我以后得当心你一点。”

这个问题，是不用孟德纯解释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孟德纯来 K 省当第一把手，从一大堆秘书当中又把他挑出来当省委书记的专职秘书，正是听了朱敦武的介绍，不错，他‘造’过朱敦武的‘反’。那是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即使是非常冷静的头脑也会卷进疯狂的漩涡里面，何况朱敦武确实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毛病。在 K 省“造反派”开始所谓的“清君侧”，争取知情人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出来揭发朱敦武的人。当然，他思想上也曾痛苦地斗争过好几天：是听中央的话，还是听朱敦武的话？朱敦武待他很好，把他从一个一般干部要到身边当秘书，参与省上所有的重大机密。“宰相家人七品官”，省委书记的秘书走出省委机关就可以当个县委书记。一九六四年，中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口号后，朱敦武就有过把他外放到一个市当市委副书记的考虑，只是因为后来的一连串政治运动才搁浅的。然而，私人的情谊终究不能抵挡来自北京、来自两报一刊的鼓动。尽管他私下认为两报一刊所批的东西并没有什么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放”等等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读到“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的社论后，他想到，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总没错，终于毅然决然地在批判朱敦武的大会上站出来揭发了他的领导。他揭发的，是朱敦武在经济上冒进，在阶级斗争上搞扩大化的错误。而朱敦武“左”的错误到了“造反派”的手上却一变而为“右”的罪行；用帽子来改变事物的本质，是“文化大革命”的诡辩术。于是他一下子成了“反右”的“革命左派”，在混乱的时势里，莫名其妙地成了 K 省机关“造反派”中较有影响的人物。到了十月，对“走资派”的武斗急速升级，邻省省委的三个书记，两个被关押起来，一个被打死，这场运动的破坏性明显地暴露了。这时，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影响暗暗地保护朱敦武的人身安全，一方面赶到北京串联的机会，通过朱敦武的老战友给中央首长呈递了一封告急信。不久，周总理就派人来到 K 省，

把朱敦武带到北京，安顿在一家医院里。以后，自己却渐渐失去了“造反派”的信任。在另一个“造反组织”来拉拢他时，他又不屑于反戈一击，叛变出卖，所以在省委机关始终是个一般干部，直到孟德纯把他挑出来……

车轮磨擦着铁轨，喀嚓喀嚓地响着。经过岔道的时候，车箱猛地摇晃了几下。孟德纯小心地把杯子放到小桌上，又继续用研究的眼神盯着他。

“如果叫你去当一个市委书记，你会怎么样干？”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来的！

他在孟德纯身边工作了四年多，他知道这个省委书记虽然和一般长得很富态，动作很迟缓的老人一样脾气随和，但对下属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提这样的问题。他的心也同火车经过岔道似的，怦然一动，表面却仍然很平静。

“那要看我有多大的权力了。”他沉吟了一下，回答说。实际上，这个回答是他早就有所准备的。

“市委书记嘛，有多大的权力还用问？你还不知道？”孟德纯拿起一根火柴在桌布上划着，做出随便聊天的神态。省委书记也尽量冲淡这个问题的严肃性。

“那当然要问一问，”他笑着说，“这就和您叫我去做买卖一样，您给我的本钱大，我就大干；你给我的本钱小，我就小干。您先不说给我多少本钱，我怎么能回答怎么干呢？”

“你这个机灵鬼！”孟德纯笑出声来，“你是不会做蚀本的买卖的。那你说，要叫你大干，你要多少本钱。”

在这四年多中间，他和孟德纯几乎朝夕相处，不但孟德纯所作的报告，就是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孟德纯原则性很强，但头脑却和他本人的脾气不一样，也许是老年人的自然衰退吧，考虑具体事务很不灵活，所以对这个秘书是言听计从的。

他俩的关系已相当亲密，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现在，在途上聊天，要比在办公室里的谈话更轻松得多。而且，这种轻松的聊天往往比严肃的谈话起的作用还大，尤其在孟德纯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明白省委书记在试探他。省委书记可以对这种聊天性质的考察不负任何责任，问他这样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真要派他去当市委书记；那么，他的回答也可以随便，可以把平时所想的直率地谈出来。

“我要的本钱不大。”他说，“我要您完全信任我，给我‘组阁’的权力。”

“当然喽，要叫一个人去当市委书记，当然要相信他喽。”

“我说的‘组阁’是指一个市的工作班子。市委领导班子，是由省委任命，中央批准的，我无权去动。市下面的各部局，应该由市委来组织，这是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起码的权力！”说到这里，他想，即使现在说了不投合省委书记心意的话而失去了这种机缘，他也要把想的话说完。他继续说：“每次，有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你都跟他们叮咛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可您不知道，他们好些功夫，都花在这种‘团结’上去了；常常为了所谓的‘团结’，还不得不去迁就某些人。如果是我自己的班子，那就不存在什么不‘团结’问题。合则留，不合则去！”

“唔……”孟德纯咕哝道，“你比我向中央要的本钱还大。”

“我要的本钱是您手头有的呀，”他笑着说，“您给这个本钱，我就能做个大买卖。您常常为省委班子内部的团结头疼，下面各级班子的‘班长’就不头疼？孟书记，您不妨先从您的权限范围开始治这个头疼。要是一级一级都这样贯彻下去——省委让市委‘组阁’，市委让区委‘组阁’，区委让各工厂企业学校等等基层领导‘组阁’，这头疼的根子就治好了。”

“你呀，”孟德纯用手指点了点他，“我看放个反对派在你旁边还差点。”

“反对派还用故意放一个吗？”他仍然从容地笑着，“不放还招

架不住哩。反对派的意见也应该听，但不能让他们掺合到班子里来。领导班子是要干事的，应当拧成一股劲。当然，如果最后证明这种‘组阁’是拉帮结派，您再解散也来得及。最终的权力还不是属于人民的？”

列车速度缓慢下来，喀嚓喀嚓的声响拖长了几拍，最后停靠在一个小站。贴着一层银色薄膜的窗玻璃上，透过来一团团朦胧的灯光。孟德纯用手指在玻璃上擦去一小块水气，向外张望了一下，但只看见一些杂乱的人影。他又靠回隔板，不知为什么叹了一口气。

他没有动。此刻，他希望把这场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虽然他和省委书记随随便便聊天的机会很多，可是谈这种话题还是第一次。过去，都议论别人，评价别的什么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现在，他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这声音很轻微，如同用两根手指在弹击，但却是明白无误的。

列车又开动了。桌上的暖气管发出咕咕的声响，一股薰人的热气带着金属的味道自下而上地弥漫出来。在列车的奔驰中，在沿着轨道滚滚向前的车轮的节奏中，在柔软、平稳的摇晃中，自有一种适于反思和推心置腹地谈话的气氛。

这时，孟德纯一半像是对自己，一半像是对他感慨地说：“现在，要从中青年干部里头挑选接班人，但是，有些老头子都按着自己的模子来挑选，有的人干脆只挑听话的。调整干部不过是换换椅子罢了，别人独出了心裁，还得他点头。他不点头人还是不敢动。这怎么行？！我要挑接班人，就要挑个比我强的……可是，有的人平常看来很能干，放上去能不能独当一面？却是个问题。闹不好，反而害了他……”

省委书记沉吟着，仿佛是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他的忧虑，望着桌上的茶杯出神，陷在自己的思索里。既然不是谈他，而是泛指别人，谈话就更加自由了。他提醒省委书记：

“我看这方面孟书记满可以放心。您三〇年在老苏区参加的革

命，到五二年，就进入了一个大省的书记处当书记。这中间经过了二十二年，您当书记也完全胜任。现在的中年干部，多半是五十年代末参加的革命，到今年，至少也二十二年了。这二十二年中经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比打日本人，打蒋介石简单。把这样的人放到一个市、一个县，还有什么不能独当一面的呢？”

“唔，唔，有道理……”孟德纯和素常听完了他的建议一样点点头。又想了一想，然后闭起眼睛，慢慢地斜躺到铺上。显然，他被这一股热气熏得昏沉了。

他看着孟德纯又渐渐入睡，轻轻拉过毛毯给省委书记盖上，打开房门，到过道上去吸烟。过道的窗玻璃上没有水雾，远处，不知是市镇还是工厂的星星点点的灯光，像萤火虫似的在暗夜中飘动，显得夜更浓黑了。一男一女两个美国人从餐车过来，目光在他身上滞留了一会儿，拉开旁边包房的门走进去。硬卧车箱那边，传来广播里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他点燃烟，凝神听了听，不是什么有名的曲子。但他还是凝神地听着。他听的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乐声，那种命运的弹指声。

三

但是，当时，在火车上，在软卧车箱的过道上，他怎么能料到此次去北京，还有命运的另一个机缘在等待他呢？……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沓稿纸，开始写准备向 T 市市民发表的“就职演说”。但写了几行字就写不下去了。

女人的小脑袋瓜里经常会闪现出一些奇异的联想。这些联想乍听起来荒唐透顶，但仔细一一琢磨，却跟抽象派或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一样，给人某种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之感。而讨厌的

就是这种不清晰的，全然模糊的某一个点和某几个点的相似之处。它像一只懒洋洋的嗡嗡作响的苍蝇，黏黏乎乎地在四周旋转，打又打不着，赶又赶不开。海南把他比作卡列宁的调侃，对文化素养较低的，对不那么敏感或不经常自省的人，其实也如秋风之过马耳，触动不了分毫，可他偏偏不是那样的人。这句冷冰冰的话，也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联想，从而更拉长他和妻子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感降低了他的情绪，使他不能开动脑筋来思考什么“就职演说”里的问题，倒把他引向关于婚姻的哲理上去。

结婚并不意味着幸福，这是他两次家庭生活给他的经验。当然，爱情是有的，并且是真正能激动人心，使人生变得瑰丽而有意义的。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对自己没有得到或没有见过的东西，一律采取否定的、不承认的态度，和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似的。可是，他虽不同意霍布斯的哲学，认为爱情只是神经系统高级部位的一种机械运动，却也暗自认为黑格尔说的，爱情不过是一个感情的过程，完全正确。既然是一个过程，那就会有始有终。开始是美好的，但终结却可悲可怕。尽管人经过或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

在他看来，他情愿和海南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如果时光可以扭转，他一定会把现在扭转到北京途中和孟德纯谈话那一天。

第二章 原来这里没有 一点罗曼蒂克

—

他走进小书房，关上了房门。罗海南仍姿式不变地坐在小沙发上，然而泪水不觉地从泪腺中渗出来，渐渐洒满了她的眼眶。她把手指关节捂在嘴唇上，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安娜·卡列尼娜》歪倒在一旁，书页散乱地慢慢溜到地上，“簌”地一声，像是老托尔斯泰的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她刚刚读到第四部第六章，“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即卡列宁——在八月十七日的委员会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的结果却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这一节。由于卡列宁原来的反对者史特列摩夫施展了诡计，带了另外几个同僚和他一道转变到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一边来，不但热烈拥护卡列宁所提出的，而且还提出同一性质可是更趋极端的法案。这样一个太趋极端的法案立即显出它的荒谬，以致政府当局、舆论、“聪明的妇女”——书上是这么说的——和报纸，异口同声都攻击起这些法案来，对这些法案的公认的创始人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表示愤慨。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卡列宁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了。但是他没有屈服，而是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宣称他要请求允许他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事件。得到许可之后。卡列宁就动身